

論謝裕民小說中的歷史實驗書寫¹

謝征達²

摘要：擅長在小說中納入歷史話語的新加坡華文作家謝裕民（1959-）在二十一世紀初生產了數部值得關注的小說。出生於戰後的他寫下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引起許多讀者高度關注。其中，《重構南洋圖像》（2005）、《甲申說明書：崇禎皇帝和他身邊的人》（2012）、《放逐與追逐》（2015），與《建國》（2018）四部小說在寫作主題上都以歷史思維出發。然而，四部書卻呈現出風格迥異的歷史多元性書寫，此現象在新華文壇仍屬少數。本文欲透過這些小說探討謝裕民歷史寫作中的多元性，進而觀察其小說裡「個體」與「歷史」之間的思想。從書寫模式而論，謝裕民也在作品中以實驗性的寫作方式開展了新華文學的寫作屬性，以多元模式書寫歷史化小說豐富了新華文學的內涵。從文學內部思考的層面而論，謝裕民將歷史與個體的關係細作剖析，以實驗性的寫作關懷歷史論述與個體自主意識。

關鍵詞：謝裕民、新加坡華文文學、歷史敘事、地理圖繪、
實驗書寫

¹ 收件日期：2019/11/30；修改日期：2020/03/22；接受日期：2020/03/28

本篇論文受教於兩位匿名評審委員提出的修改建議，謹致謝忱。

²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

A Discussion on Singapore Chinese Writer Chia Joo Ming's Novel and his Experimental Writings³

Seah, Cheng-Ta⁴

Abstract: As a Singapore Chinese Writer who is incorporat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courses in his novels, Chia Joo Ming (1959-) wrote historical novels in the 21st century that gained interests from readers worldwide, namely *Reconstructing Chinese Images* (2005), *1644: The Year A Dynasty Was Hanged* (2012) and *Exile or Pursuit* (2015) and *Kian Kok* (2018). The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novels and analyse the experimentalisms in Chia's historical writing. The works are written with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s, with also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narrations and their suitability in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In other words, Chia's attempt in the novels showed experimental approach in writing that extended the dimensions in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while also displaying the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history.

³ Received: October 31, 2019; Sent out for revision: March 7, 2020; Accepted: March 17, 2020.

⁴ Ph. D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eywords: Chia Joo Ming,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ical Narrative, Geographical Mapping,
Experimental Writing

一、前言

什麼是歷史？誰在寫？誰在看？或者誰在賣？誰在買？大家都急於在賣以致供過於求，劣品充斥市場。許多時候歷史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的需求去摘一章或半頁的過去，使自己站得住腳或令自己獲益。是今人與古人互利互惠的一種方式。大家大可不必為歷史而操心，何況三五十年在歷史上可能不足構成一個段落。——謝裕民《世說新語》⁵

謝裕民（1959-）是近年來新加坡華文文學中表現出色的小說家之一。⁶他曾就讀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學和實明工藝中學，高中就讀於新加坡技術學院，從他的學經歷來看，可將他歸類於末代華校生⁷。謝氏從七〇年代開始出版文學作品，本身是華校生，也是新加坡華文文學論述的重要代表，此時的謝裕民也持著這個脈絡進行在地歷史式的創作。一九七八年，他與兄長希尼爾（謝惠平，1957-）合著《六弦琴之歌》（1978）。早期，謝裕民的作品多以詩歌為主，後來開展小說，並且獲得出色的成績。自華校走入歷史之後，他以苦悶的青春歲月為題，寫下青年學子對未來的徬徨與迷失，有詩集《綁架歲月》（1989）和小說集《最悶族》（1989）。至此，大抵可推論其創作初期，書寫的關懷圍繞於快速的都市發展與個人壓抑。

5 謝裕民：〈江湖氣的知識分子：殷宋璋發問·謝裕民作答〉，《世說新語》（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1994年），頁175。

6 下文簡稱「新華文學」。

7 1980年代新加坡政府結束華校的運作，與英校進行整合活動。那一輩的年輕人被迫從接受華文教育改為英語作為媒介語的學習環境。許多人因此受到波及，在就學、求職的道路上險阻重重。另外，許多新華作家以華校生的遭遇為主題，進行文學書寫，成為新華文學裡獨樹一格的聲音。

一九九〇年代後，謝裕民則出版極短篇《世說新語》（1994）與小說集《一般是非》（1999），其漸趨成熟的書寫體現在探索性的城市文學，集中描寫新加坡的社會現況，特別是現代人的種種煩惱。隨後，《重構南洋圖像》（2005）、《M40》（2009）等新加坡歷史相關的小說出版，進一步確認他對書寫歷史的熱愛。此階段擴大創作視域，且從嶄新的書寫角度重塑新加坡的歷史，諸如新加坡地名探詢、新加坡華人的身分認同與差異的價值觀。而最新出版的《建國》（2018）可說是歷史化小說的集大成作品，看似羅列二〇一五年的報章詞條，卻在不經意間寫下政策變動後對一般民眾的影響，「立國」與「建國」間斷代的隔閡等，都是他現實生活的關懷，借此寓彼的意味濃厚。由此可知，小說成為他思想的重要投射。美國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曾將謝裕民納入「新加坡華語語系的十個關鍵詞」之一，特別是談論謝裕民小說中「孤島遺民」的強調在地性的論述。⁸此外，謝裕民也獲獎無數，如小說《歸去來兮》在一九八七年獲「第三屆金獅獎文藝創作比賽」小說組第一名，一九九三年獲新聞與藝術部頒「青年藝術」獎，一九九五年受邀至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同時也是二〇一二年「青年藝術檔案計劃」選定作家之一，是新加坡華文文壇中生代裡不可忽視的重要作家。⁹

⁸ 王德威：〈華語語系的人文視野與新加坡經驗〉，《華文文學》，第3期（2014年3月），頁5-20。另外，王德威也以謝裕民的小說《重構南洋圖像》為名，寫了一篇〈重構南洋圖像：理論與故事的交鋒〉，《漢學研究通訊》，第37卷第1期（2018年02月），頁1-7。

⁹ 關於謝裕民的相關文章有：高嘉謙：〈城市華人與歷史時間：梁文福與謝裕民的新加坡圖像〉，收入鄭毓瑜主編：《文學典範的建立與轉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年），頁493-516；張松建：〈家園尋根與文化認同：新華作家謝裕民的離散書寫〉，《清華中文學報》，第12期（2014

自一九九〇年代始，許多華文地區作家都期待以文學形式拼貼出一幅曾經被忽略的歷史環節，完整一條（虛構的）地方歷史脈絡，同時思考如何從文學展開對歷史進程的書寫。其中，謝裕民在這方面的努力相對突出，且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文學風格。他的實驗性書寫闡述一個重要的關鍵：歷史的敘述可以是多重的，亦也是多元複述的。印籍學者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 1947-）以「歷史碎片」（historical fragmentaries）警惕從不同層面閱讀歷史的重要性。查特吉以孟加拉歷史長期潛伏於主流歷史之下，認為孟加拉並非「沒有歷史」，而是有許多當地歷史被漠視與忽略。¹⁰ 更重要的是，查特吉堅持每個地方都有其歷史，而且都由複數的歷史（histories）組成，強調它應有多面交錯；或引述他的理論說辭，是由眾多的「碎片式」（fragmentary）歷史組成。由此可知，「不完整性」、「破碎化」不僅是歷史的本質，也因為它的不完整，提供了寫作者書寫記憶的機會。本文試圖從實驗歷史寫作的視角出發，探討《重構南洋圖像》（2005）、《甲申說明書：崇禎皇帝和他身邊的人》（2012）、《追逐與放逐》（2015）與《建國》（2018）四部小說，深究書寫對歷史補遺的實際效用，藉由謝裕民新穎的創作模式審視他在新華文學的位置，從而理解新華作家為了突破歷史書寫困境所做的努力。其次，本文列舉的四部小說雖圍繞著歷史語境展開，但是各自有不同的側重點：《甲申說明書》關心的是明代史以及歷史論述的重組對

年 12 月），頁 425-467；朱崇科：〈論謝裕民對新加坡性格的再現〉，《玉溪師範學院學報》，第 33 卷第 1 期（2017 年），頁 22-31；黃曉燕：〈新加坡作家謝裕民筆下的歷史書寫〉，《外國文學研究》，第 6 期（2018 年），頁 64-72 等。

¹⁰ 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76-77.

歷史的評價；《重構南洋圖像》中系列故事從地方出發，關注的是跨界移動的足跡，建構出華人移民的地理圖景，再現新加坡華人對自我身份的反思；《放逐與追逐》則聚焦於一九七〇年代出生的新加坡中學生的成長故事，該著描述新加坡獨立後一代人對本國歷史的觀點，探討新生代對自我成長地方認知的缺乏；《建國》則從新加坡建國以來到二十一世紀，反思國家建立的歷史及其意義。整體上，本文欲透過謝裕民小說中所展示出的歷史主題，且進一步探討他在小說中「有意識」的對不同時代的歷史進行書寫，在探討謝裕民以多元模式書寫歷史化小說豐富了新華文學的內涵外，從文學內部思考的層面而論，謝裕民也將歷史與個體的關係細作剖析，以實驗性的寫作關懷歷史論述與個體自主意識，成就其書寫小說歷史實驗書寫的风格。

二、碎片化的補遺

西方歷史小說濫觴於十九世紀。著名的匈牙利文藝批評家格奧爾格·盧卡奇（György Lukács, 1885-1971）指出是瓦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在文學上首先將歷史作為一種社會和文化上的特定背景設定。盧卡契進一步指出：「歷史小說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文類，其本質是描述人類歷史活動，其敘述形式擬想社會和人的存在的何去何從。」¹¹ 現實的呈現成為了文本中的一個重要考量。司各特後來開展出蘇格蘭歷史小說包括《威佛利》、《羅布·羅伊》、《十字軍英雄記》等；而中國歷史小說，始於宋代講史話本，

¹¹ 王班：《歷史與記憶：全球現代性的質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03。

如《新編五代史平話》和《宣和遺事》等。¹² 明清時期的歷史演義小說則更廣為流傳：如《東周列國志》、《三國志通俗演義》、《隋唐演義》等。它們所講述的不僅是過去的史實，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的作用。然而，經典中文歷史小說在新加坡教育體制下並不受到重視，新一代年輕人對此毫不關心，甚至是缺乏「歷史感」。曾有華文教師在《聯合早報》上寫下：

我在過去幾年編寫儒家倫理教材時，便發覺到許多年輕人連清朝和明朝的概念也沒有，更不用說到周朝和戰國春秋了！最近我也聽說在一間名校裡，有一班中一的學生，在四十人當中，竟沒有一個知道廣州在哪裡？雖然她們當中有不少人是屬於廣東籍的！

她進一步提及新加坡是個年輕的國家，年輕人更注重的是「未來」，很少會回顧「過去」。另外，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工商業的快速成長，使得年輕人所關心的是「怎樣在個人職業上做好準備，以配合國家的需要」，因此忽略了文化與歷史的認識。¹³ 由此可知，歷史化小說在新一代讀者眼中受到冷落，與國家歷史發展、教育政策等方面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謝裕民長期在報業，能快速掌握時事，他在二〇一二年出版《甲申說明書》，除了增補了新華文學的內涵，讓新加坡華文文壇增加一部適宜新華讀者閱讀的「史書」之外，也是借他史對在地文化進行補遺。嚴格來說，謝裕民的《甲申說明書》在內容上更貼近歷史講述，文類上屬歷史小說（historical

¹² 張中良、秦弓：《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小說敘事》（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頁96。

¹³ 劉蕙霞：〈歷史課程與年輕人的「歷史感」〉，《聯合早報》，第16版（1989年5月5日）。

fiction)。然而，作為整體小說書寫脈絡的理解，《甲申說明書》中的崇禎皇帝似乎代表著謝裕民小說書寫的核心關注。他透露道：「回到小說。我的小說大部分人物都對自身的命運充滿無力感，包括崇禎皇帝。現實如此，生活如此，小說外的我們，誰不是？」¹⁴ 從對不同小說中的歷史關注，謝裕民凸顯人物的無力感，正好反映他在寫作路程中未曾放棄的初衷——反思個人與社會間無法理清卻又彼此牽制的狀態。

內容上，《甲申說明書》探討了明朝末年的最後一任崇禎皇帝，該著以倒敘結構開展敘事，敘述崇禎皇帝在李自成入侵皇宮之後自殺的悲劇。其中，最特別的是以新加坡的視角書寫，作者有意將明代的故事以新加坡式用語呈現，藉此形構出與新加坡讀者的對話。例如在小說論述中夾雜英語，令其更為「親切」：小說中提到皇太極經常率領軍隊掠奪明朝地區資源，作者兩次戲稱這一舉動為「南下 shopping」。¹⁵ 另外，他也將崇禎皇帝頒布的「衣袖不許過一尺五寸」禁令緣由進行調侃，指說在皇朝為難之時還要 dress code，與當時應該加強平息內戰的主調偏離了。¹⁶ 另外，譏諷意味濃厚的文字亦帶入新加坡語境，如小說中提到崇禎朝的「三餉」（稅收）是 1670 萬兩時，謝裕民將它兌換成新加坡幣值，並指說是 14 億零 280 萬新元。¹⁷ 中英夾雜的論述與正史敘述模式差異極大，且刻意將嘲諷置入政治影響民生的事實，這種論調一方面拉近新加坡讀者

¹⁴ 謝裕民：〈寫給未來的書：陳宇昕與謝裕民對談〉，《建國》（新加坡：富豪仕大眾傳播機構，2018 年），頁 279。

¹⁵ 謝裕民：《甲申說明書：崇禎皇帝和他身邊的人》（新加坡：青年書局，2012 年），頁 100。

¹⁶ 謝裕民：《甲申說明書》，頁 194-195。

¹⁷ 謝裕民：《甲申說明書》，頁 144。

的距離，另一方面則以一種非傳統的方式進入新加坡語境，探索中國與新加坡之間混雜的文化認同，甚至是通過窺探崇禎皇帝的生活來影射現代人無法掌握生命的無奈。

小說的核心思想有兩個明確的層面：一、歷史的哲學；二、人性的叩問。這兩個層面是謝裕民在這部小說中想要傳達的意義，也是一位新加坡作家期待此價值觀能帶給全球讀者的訊息。由此可見其對歷史的哲學思考在《甲申說明書》有著置入性的標誌作用。例如，談到李自成的傳奇人生時，謝裕民下了一個富有意義的註解：「一六二九年如果驛站不裁員，他可能還是一名稱職的驛卒，而不是一天的皇帝，或一名和尚。歷史選擇了他，但他沒選擇歷史」¹⁸；對人性的叩問則是《甲申說明書》裡加重情感書寫的表現，這也讓這此書脫離歷史演義小說一貫「重史輕文」的寫作模式。尤其是小說裡對崇禎皇帝身邊的臣子的人生敘述，在明朝滅亡前後的態度有細緻描寫。作者首先提到在明朝滅亡後相繼殉國的大臣，一共約四十餘人，當中也有兩人私約或闔門縊死者」。¹⁹ 小說將歷史與價值觀結合，展開以史為鑒的論述。

另一部小說《重構南洋圖像》，巧合地提及祖先與明朝的關係，可視為《甲申說明書》的續篇，兩部書中皆追溯著華人歷史的脈絡，但與「尋根文學」不同的是，前者更重視歷史的橫向傳播，而非縱向繼承。《重構南洋圖像》中的〈安汶假期〉有著典型的尋根意識，但卻是無疾而終的結果。小說的主角是明朝時期到安汶一帶定居的移民漂流者——朱姓父子，他們的祖先欲前往台灣投靠鄭成功，不料途中遇到颱風，被迫漂到安汶島上，並且與當地土著女子成親，

¹⁸ 謝裕民：《甲申說明書》，頁 138。

¹⁹ 謝裕民：《甲申說明書》，頁 19。

幾經波折才把幼子送回中國。輾轉過了一些時日後代才終於又回到安汶島尋親，卻遇上排華事件、金融危機。這部小說表現的是人在面對歷史時有著沈重的無力感，這種無力感的一部分來自於歷史的急速流失。

現在附近沒有人會花太多心思與我們爭辯這些名字屬誰。但是，我們卻一定要這麼做，因為我們只有這麼一個小島，我們必需捉住一些依據，否則，我們就不存在。——謝裕民〈島嶼前身〉²⁰

小說集中主要由三個文本組成：〈安汶假期〉、〈民國二十四年的荷蘭水〉與〈島嶼前身〉。²¹ 整體編排來看，三篇作品緊貼新加坡的歷時發展，時間跨度向前推至明清華人移民的軌跡，到新加坡殖民抗戰時期，再過渡到國家獨立的再現，進一步延展了華人移民網絡的鋪展。謝裕民以小說圖繪一座城市的歷史，使得不同年代的華人歷史論述都指向一個最為重要的核心觀念：探討一個人身份多重性的可能。

《重構南洋圖像》中第一篇小說〈島嶼前身〉從地圖中尋找新加坡的源頭，其書寫模式重視新加坡歷史的重構，並對新加坡的起源與定位做重新的思考。地理圖像在小說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布萊恩·哈利（Brian Harley, 1932-1991）與大衛·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 1942-2004）認為，地圖是圖像再現（graphic representa-

²⁰ 謝裕民：〈島嶼前身〉，《重構南洋圖像》（新加坡：富豪仕大眾傳播機構，2005年），頁16。

²¹ 〈安汶假期〉一共有五稿，第一稿（1997-1998）、第二稿與第三稿（1999）、第四稿（2003）、第五稿（2004）；〈民國二十四年的荷蘭水〉（1999年起稿，2002年完稿，2003年發表於《聯合早報·文藝城》）；〈島嶼前身〉（2000年起稿，2003年完稿併發表在《新華文學》第60期）。

tions)，用來幫助人類理解事物、概念、狀態、過程與事件。²² 地圖也因此成為找尋地方「前身」的絕佳工具。在〈島嶼前身〉中的「新加坡」歷史與中國保持著高密度的聯繫，在小說裡的「新加坡」一詞並非是一直以來新加坡人腳下土地的名稱。「新加坡」這一稱謂的使用時間比「過去的一些名字都還要短」²³，故此，不同名稱指稱島國的不同的歷史階段。這些名稱包括古典記載的「普羅中」，如許雲樵在一九五〇年代指出三國時代吳國（222-280）文獻中有「普羅中」（新加坡）的影子。此外，小說中再引唐朝的《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與明代《鄭和航海圖》意在呈現「新加坡」的古老痕跡。²⁴ 這些不同文獻裡的記載除了述說新加坡的家國寓言，補足了在地歷史的發展敘事，也為新加坡的歷史添增許多文化內涵。〈島嶼前身〉中不斷回看地圖與文獻中「新加坡」的名稱，體現出尋找新加坡「前身」的急迫性。

事實上，在謝裕民的小說中，名字意味著一種存在的狀態，意味著在虛構與想像、歷史與事實、地理與知識之間穿梭的同時，也是一種對於既定史實的重新架構。然而地圖並非是完全可信的，小說中也對地圖記錄準確度的質疑，例如小說中的《鄭和航海圖》「有

²² 地圖的英文“map”與許多歐洲在地語言如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波蘭語等都源於拉丁語“mappa”，意指桌巾或餐巾。法語一詞“carte”則源於另一個拉丁字，“carta”，也成了意大利語和俄羅斯語的“carta”與“karta”的詞根。而希臘語“Pinax”則指一由木、鐵或石頭所制的片匾，當中畫或刻上了文章或圖像。Jerry Brotton: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 New York: Viking, 2012, pp. 4-5.

²³ 謝裕民：〈島嶼前身〉，《重構南洋圖像》，頁 13。

²⁴ 高嘉謙：〈城市華人与歷史時間：梁文福與謝裕民的新加坡圖像〉，收入鄭毓瑜主編：《文學典範的建立與轉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年），頁 512。

些地方方位擺錯了」；「長腰嶼」的位置是被錯擺在吉利門的東北方面」，二〇〇〇年至二〇〇一年的街道指南中，拉柏多公園與丹戎布拉雅（Tanjong Berlayar）公園其實無實質之隔。謝裕民提出的「新加坡」是多種變化的可能，強調「島嶼的未定論」²⁵，象徵著不斷變動中的新加坡才是它的原貌。

如果說〈島嶼前身〉是以地圖搜索著新加坡的定位，〈民國二十四年的荷蘭水〉則是從工具書作為跨代知識傳輸的媒介。故事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到現代二十一世紀的四個不同時空組成。時間點分別是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七年、一九九八年與二〇〇二年。敘述者「我」（李鴻勳）從兩本書中掌握了製作汽水的方法。一本是一九三六年出版於上海的《新中國教科書師範學校實習指導》，另一本是本地出版的《一九四七年南洋年鑒》。這兩本書中關於民國時期的汽水製作方式是重要的知識傳遞。小說講述從江南小鎮教書的老師離散到新加坡《南洋商報》，負責編寫《新南洋年鑒》中的「汽水」條目，但他留下整理汽水製作方法的筆記後便匆匆回到上海參與抗戰行列。從在一九三〇年代中國教科書上的課本的科學知識，到一九四七年南洋的家庭工藝，汽水的知識成了日常生活的產物。知識傳輸與離散的華族在故事中有所呼應，然而，近代對於「知識」的輕視，可見作者在小說裡質問了現代人對歷史仍缺少應有的理解與尊重。

與〈島嶼前身〉及〈民國二十四年的荷蘭水〉中邊界反思及知識傳承相近，〈安汶假期〉的離散故事與新加坡（人）的歷史緊密結合，講述著南洋華人回返「安汶」尋根的奇遇。²⁶ 小說的「我」

²⁵ 謝裕民：〈島嶼前身〉，《重構南洋圖像》，頁 35。

²⁶ 安汶（Kota Ambon）是印尼的一座港口城市，馬魯古省的首府，也是印

是一位朱姓的新加坡華族青年。「我」的十世祖從明清之際漂流至安汶島後，迫於無奈在當地落地生根。後來，十世祖將幼子（即「我」的曾祖）委託給友人「闕名」帶回中國。後來祖父長大後得知印尼仍有親戚，便在一九六五年南下尋根。這一年開始尋根似不是個巧合，因為華人的生命在當時受到了威脅。一九六五年的印尼發生了排華騷亂。後來「我」的父親得知自己是明朝皇族後裔，更有親人在印尼，於是和「我」前往安汶尋親。然而，與我們多數見到的小說敘事不同，這裡的尋根並不是回到中國，而是南下到印尼，打破了「根」在北方的思維，從不斷的跨界行旅中游走在錯綜複雜的離散網絡。小說對「根」的移動而轉變展開思索。這一重新尋找身分的過程似乎讓年輕的敘述者「我」，在移動於祖國與所在地之間形成的龐雜網絡有所感觸，牽扯出的是一系列對自我身份的質問：「我們的血統到底要追溯到哪裡？身份的保存是不是有個期限？誰知道再往前追溯，會不會不是漢人？」南來遷徙的故事對於來到新加坡的第二代與第三代人越來越模糊。對敘述者而言，他們的身分如同「隔夜菜」，因為時間的久遠而逐漸失去了找尋的意義。然而，隔夜菜的比喻也似乎在暗喻一種對於源頭追尋的不必要，畢竟源頭已經隔了太遙遠，尋回的動力也因而消退。從明代之後已失去與祖國的聯繫，找尋遙遠的血脈親人看似一種遲來身分的填補。將小說的虛構與真實的在地歷史交錯，以地理、古蹟、記憶與歷史的碎片，

尼東部最大的城市。此地盛產香料，吸引了西方殖民帝國的興趣。葡萄牙人於 1521 年在此建立據點。1605 年，荷蘭人趕走葡萄牙人，佔領安汶島，設立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總部。此後一直到印尼獨立（1945 年），除了一度被英國短期佔領外，安汶大部分時間均屬於荷屬東印度的一部分。可參閱張松建：〈家園尋根與文化認同：新華作家謝裕民的離散書寫〉，《清華中文學報》，第 12 期（2014 年 12 月），頁 443-444。

《重構南洋圖像》構成對「新加坡」當代形構的多重詮釋。

從《甲申說明書》到《重構南洋圖像》，我們看到了明代到二十世紀華人社會的移民脈絡，謝裕民小說中對在地書寫的意圖十分明顯。回到新加坡史的脈絡中，擁有在地特色的文學作品從一九八〇年代後形成趨勢。起因於一九八二年，當時的交通兼勞工部長王鼎昌（1936-2002），在阿裕尼文藝創作與翻譯學會主辦的「新馬華文文學史展」開幕禮上，提出了「建國文學」的口號。²⁷ 當時，南洋商報與新加坡寫作者協會，決定以實際行動響應「建國文學」的號召，聯合策劃出版了一套《吾土吾民創作選》（共分六大冊，即小說二冊、詩歌、散文、戲劇和歌曲各一冊）。作品以吾土為背景，以吾民為題材，當時也啟發了一批作家開始創作具備在地色彩的作品。一直至二十一世紀，從在地出發作為推廣要素的文學作品在新加坡已然成為作家們爭相仿作的主題。例如以在地特色，例如丁雲《最後的義順村》、張揮的《雙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等書。從新華文壇的發展而論，小說集《重構南洋圖像》在以本土為出發的寫作中開拓了區域，從中國移民到東南亞華人，乃至世界華人身份的思考，形成了以地理跨界移動為背景的論述。

²⁷ 在演說「建國文學」的主義中，王鼎昌提出了兩點。一、文藝界人士和知識分子，應該深入社會民間擴大眼界，並從歷史文獻之中發掘適當題材，以深入淺出、生動有趣的通俗文筆，創作一些富有啟發性的故事、小說和短劇等文藝作品，作為新加坡人民的精神糧食。二、新加坡人民在迅速的社會變化和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現代生活對人際關係所產生的影響和心理變化，家庭分裂所帶來的問題和產生的人生悲哀，現代新加坡人應有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等重要問題，都可以提供許多寫作的良好題材。黃孟文、徐迺翔主編：《新加坡華文文學史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與八方文化企業公司聯合出版，2002年），頁213。

三、個人的歷史敘事

羅格斯大學教授王班在《歷史與記憶：全球現代性的質疑》中指出了一個文學從重視歷史走向了生活化的現象：「從八〇年代末至九〇年代，個人寫作，主要是散文和回憶作品，很有興旺之勢。這個有趣的症候，暗示文學開始從史詩敘述中理想和生活的整合，走向離散、零碎的感官經驗，注重個體感覺、快感，欣賞意象營造和趣聞軼事。零散、隨意的個人記憶，代替了歷史敘述和文化記憶的整合邏輯」，「散文化的感情結構預設的是一個『歷史中的生活』」，他進一步解釋到：「歷史中的生活，就是只顧眼前個人瑣事，將歷史拒之門外。歷史只是國家政府、歷史學家關心的事。歷史的生活則假定，個人也是歷史的一部分，歷史人人都有份，我們應參與歷史進程，發揮能動作用。」²⁸，文中強調「個人也是歷史的一部分」的思考是謝裕民小說中非常重視的一環，特別是下文論述的《放逐與追逐》與《建國》，這兩部作品從「個人」的自主意識出發，從移民軌跡的「大歷史」敘述轉移到平凡人物的「歷史中的生活」，強調的是個體對歷史、語言、文化等面向所擁有的詮釋權。

一九六五年新加坡獨立，雖然新加坡人仍擁有自由選擇媒介語言的自由，即中文、馬來文或淡米爾文為教學語言的學校。但是，在英語開始成為商業與政治的主流後，大多數學生選擇英校，華校收生率大幅銳減。在一九七八年，政府決定將原本以華語為教學語的南洋大學與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為以英語授課的新加坡國立大學，華校畢業生少了升學之路。隨後，南洋大學與華文學校的關閉表證新加坡華

²⁸ 王班：《歷史與記憶：全球現代性的質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04。

文教育走向終點。這段末代華校生的背景是華文作家們爭相述說的主題，它能勾起民族、文化、語言、身份等複雜的思考。從新華文學中的歷史獨白，到跨界的集體記述，前述《甲申說明書》以宏觀的中國歷史為背景，意圖以古觀今；《重構南洋圖像》中則從移民的地理移動思考新加坡人的身份。兩部小說都在宏大的歷史脈絡底下找尋身分認同。而《放逐與追逐》文字輕省，故事線條明確，小說中的青年形象鮮明，探討著青年初出社會遇到的問題，從學業、感情、乃至之後的事業、家庭等，主題明顯針對中學生讀者群。小說裡敘述的一九七〇年代出生的一群人，是與新加坡共同成長的一代。

「個人也是歷史的一部分」的思考在《放逐與追逐》這部成長小說中有跡可循。該小說以一位七〇年代出生的華校生翁福良的人生為故事主軸，時間跨度從七〇年代到九〇年代，體現個人經驗史之外，也反映出家國發展史。小說附錄〈寫壞了也得寫：林高、謝裕民對談〉中直接表述了小說內容與作者之間的關係。謝裕民表示該小說的完成是因為「（自己）一直想寫一個與自己成長經歷相關的故事」。²⁹ 小說除了寫出新加坡獨立後出生的一代人與家國演變的對讀，到從亞洲地區新、馬、港、台間地域性移動，在地方到個體的閱讀為青年讀者提供跨界思維；另一方面，小說關注更多的是個體與生活環境，歷史文化等元素的互動。小說以福良在不同人生階段的三段愛情為敘事，從少年到中年，反映的是福良的成長過程。福良出生平民家庭，父母親經營雲吞面攤檔，幼年艱苦的日子讓他更能理解社會百態。故事中顯現一九七〇年代學生經歷著對晚輩述說經歷的語調，重顯歷史與生活的息息相關。現實與理想總是充滿著衝突。當福良的爸爸給「地

²⁹ 謝裕民：《放逐與追逐》（新加坡：富豪仕大眾傳播機構，2015年），頁228。

牛」「咖啡錢」時，福良堅持「不要用現在賄賂或貪汙這麼嚴重的眼光看那年代的事。」福良與從印尼新來的女同學秋雲萌生情愫。然而，秋雲後來到英國留學，只能與福良分開了。對福良來說，十六歲的他面臨了一段無助的階段，無論是在學業、愛情、甚至是未來都是一片茫然。

在新華文學當中，以華校生尋找出路、或是以華語式微狀態為主題的小說不在少數，有英培安的《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張曦娜的《入世紀》、還有張揮的《末代華校生的網中歲月》等，都以華校生為主題。《放逐與追逐》則是從一位新加坡青年對自身身分的思索出發，再現一代新加坡人的故事，也是一則獨立後新加坡的家國寓言。對於身分，英國文化研究理論家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 1932-2014）曾指出身分產生於內部的衍化：「我們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經完成的、然後由新的文化實踐加以再現的事實，而應該把身分視作一種『生產』，它永不完結，永遠處於過程之中，而且總是在內部而非外部構成的再現」。³⁰ 然而，《放逐與追逐》重視著個人與歷史的關係，在更多時候以生活故事為本位，從主人翁的日常開展對歷史的反思。小說中的其中一個詞「華人直升機“Chinese helicopter”」與身分認同有直接的對話。

華校生將 Chinese educated 說成 Chinese helicopter，所以，Chinese helicopter 成了華校生的謔稱。他只能自嘲：「Yes, made in 1960.」1960 年的直升機。³¹

³⁰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0, p. 220.

³¹ 謝裕民：《放逐與追逐》，頁 87。

小說中的福良卻是在被動的邊緣地下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身份認同，當社會被稱為“Chinese helicopter”。³² 性格上，樸實無華的福良雖然在學業和工作表現上都不是非常突出，但是他單純的個性能為他帶來意外之喜。這一用詞在謝裕民的另一部小說《建國》中也出現，甚至還成為了該小說中重點關注的「邊緣群體」討論中的貶義詞之一，小說中提到：「『大多數』曾在社會被戲謔為 *Barisan*³³，在小朋友群眾被戲謔為『是不是』，在軍中被戲謔為 *Chinese Helicopter*，最嚴重的指控是『華文沙文主義』」³⁴，顯而易見的是，華語邊緣化的位置甚至達至個體面對被「標籤化」的危機。

雖然小說中描寫的是一九七〇年代的故事，但在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新加坡社會面對的問題依舊。整體來說，《放逐與追逐》少了歷史的陳述，多了回顧新加坡上個世紀的文化轉變，特別是華人在語言及其文化層面。小說呈現的人物偏向直接的單純與善良，例如，福良的老師傅老師指著盤裡的螃蟹問他：「吃辣椒螃蟹，你說什麼最重要？」福良並沒想多，立刻就回答：「螃蟹！」福良便是如此直接沒心機的一個人。然而，也許並非不是一個善於謀畫的人，他對於自己的未來並沒把握，令他在感情上跌跌撞撞。在服兵役的時候，福良認識了 *Eileen*，展開第二段戀情。可是，在身份認定上，他屬於橙色（受中文教育）而 *Eileen* 屬於綠色（受英文教育）。「她愛去 *Disco*，一大群人在鬧喧的音樂下解放自己，他則只想去咖啡座喝喝茶聊聊天。她為了理想，寧願跟那班人混，過後才陪男

32 “Chinese helicopter”一詞直譯為「華人直升機」並無疑義。這一用詞是對於不善說華語的華校生的嘲諷。

33 *Barisan* 是 *Barisan Sosialis* 的縮寫，是社會主義陣線的馬來文。是從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分裂出的左派黨員在 1961 年創立的新加坡左翼政黨。

34 謝裕民：《建國》，頁 78。

朋友。」³⁵ 也因為如此，他們最終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此處探究的不再是國籍或是民族之間的界限，而是新加坡內部的語言規律與世代間的文化差異。

出版於二〇一八年的《建國》更是圍繞於新加坡建國歷程的思考。該小說形式主要分成兩個部分。一是主要故事的敘述，有「文字生活」、「數字生活」、「繼續生活」三個部分。小說以一九五九年出生的建國為主角，建國還有個小他六歲的弟弟，名叫立國，這裡無疑隱喻了主角與國家的關係之外，也對應了新加坡在二〇一八年開始採用的「建國一代」與「立國一代」方針來對年長人士提供關注與優惠³⁶；二是分成十二篇的 SG50 辭典，當中的每個辭條與新加坡發生的事都息息相關。故事的另一主線以主角「建國」的視角敘述。然而，就算是虛構小說的部分，也不斷出現真實的社會新聞、歷史事件，如地鐵癱瘓、生育問題、退休計畫、健保計畫、選舉、華語運動等。甚至出現了大量的數據資料，例如幾個年度的《人口白皮書》的未來人口數量，一九五〇年代戰後小孩出生的具體數字，新加坡衛生部在二〇一四至二〇一五年公佈的新加坡人口死亡主因中，有關於個別因素的數字與比例，還有經濟生產力數字等都疲勞轟炸式地出現在讀者面前。面對這些龐雜的數字與充滿疑惑的歷史事蹟時，主角「建國」雖然總顯得不知所措，但卻也意識到解決問題的急迫性。

《建國》中的主角也出現對歷史敘述的質疑，浮現出獨立的思

³⁵ 謝裕民：《放逐與追逐》，頁 108。

³⁶ 新加坡政府對「建國一代」的定義是在 1949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出生，並在 1986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成為新加坡公民，在本地生活或工作的第一代新加坡人。「立國一代」則是出生於 1950 年 1 月 1 日到 1959 年 12 月 31 日，並於 1996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成為新加坡公民的人士。

維。小說的開端即對新加坡「獨立五十週年」一事進行質疑，到後來甚至使用符號「SG50」。建國選擇放棄對用詞的執著，主張「一個五十，各自表述」。³⁷ 主角質疑著新加坡所擁有的歷史年度。因為在無意間發現新加坡的歷史可以往前跨越到七百年時，對當下的時間錨定感到極度不滿，並說道：「歷史往前跨越七百年，無論輝煌或黯淡，都是重大事件，為什麼五十年來不見大量的討論，報導，只是教科書說了算。同一個地方，正慶祝建國五十周年，是不是可以也慶祝跨前七百歲？」³⁸ 建國不斷對自己的人生產生質疑。因為人們在強調「精準」的背後，卻生活得越來越辛苦。³⁹ 建國開始想尋找快樂的方法。保持精神的自主獨立成為了主角建國開展寫作小辭典的想法。他認為擁有許多故事的小說就像烤肉串（satay）一樣，要有「竹籤」把它串起，需要尋找一個能將許多故事串連在一起的「竹籤」。⁴⁰ 建國以「SG50 小辭典」的形式，嘗試把新加坡的點點滴滴紀錄下來。作者除了以隱喻的方式表現現有的新加坡史的不完整，同時也嘗試在報紙新聞中講述多元歷史的可能。為地方社會而思考的個體在謝裕民的其他小說中也略有端倪，例如在小說集《壹般是非》中的〈國語〉一篇，其故事主角阿國因為對國家未來的擔憂而選擇離去；另一篇〈鐵絲網的旅遊風景和社會責任等〉因悵然若失而四處遊走的主角，都對國家文化與未來有著濃厚的責任感。然而，《建國》與前述的幾個小說不同之處，在於小說從「個人也是歷史的一部分」進展至「所有個體都是歷史的一部分」的呈現。

37 謝裕民：《建國》，頁 6。

38 謝裕民：《建國》，頁 266。

39 謝裕民：《建國》，頁 96。

40 謝裕民：《建國》，頁 131。

韓少功（1953-）在一九九六年發表的長篇小說《馬橋詞典》或許可以為閱讀《建國》帶來更多思想上的碰撞。⁴¹《馬橋詞典》與《建國》中 SG50 辭典的模式類似，有著詞典的架構、編撰解說、詞條釋義等架構，讓小說具「辭典」形象。《馬橋詞典》中也透露歷史所暴露出的問題，敘述著「馬橋人」受到了被「普通話」的危機。韓少功在《馬橋詞典》的〈編輯者序〉中提及道：「如果我們承認，認識人類總是從具體的人或者具體的人群開始；如果我們明白，任何特定的人生總會有特定的語言表現，那麼這樣一本詞典就是沒有意義的。」⁴²與《馬橋詞典》不同的是，《建國》中將解釋的詞條與故事論述分開，相互交叉形成兩條平行論述。⁴³然而，兩者在對地方與人之間的關係進行的深度思考。如果說《馬橋詞典》創造了「馬橋」群體的歷史來抵抗被中國主流文化同化的危機，《建國》中的辭典建構則是藉由「詞條」找回新加坡所發生的被遺忘的敘述。《建國》中出現的「詞條」都敘述著新加坡所發生的事件，無論是關於夜晚在公共場所禁止喝酒，或是測試無人機飛往烏敏島送信，所有重要時間點或是看似容易被遺忘的鎖事都記錄在冊。這也是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作者欲突破嚴謹的歷史架構，創造出「微歷史」的解讀。這一「微歷史」所對應的

⁴¹ 韓少功在出版《馬橋詞典》前，於 1985 年第 4 期的《作家》發表了〈文學的「根」〉，該文章被看成是「尋根文學」的宣言，引起了廣大的迴響，也開啟了後來尋根文學的興起。

⁴² 韓少功：《馬橋詞典·編輯者序》，《小說界》，第 2 期（1996 年），頁 6。

⁴³ 謝裕民對於此書的架構做出以下註解：「小說還沒寫之前的構想是，把 2015 年的新聞編成一部字典。開始編不久，發現太 raw（生），還是需要故事。那時都在說『建國 50 週年』，戲言要寫一本 SG50 小說，書名就叫『建國』，男主角也叫『建國』。然後，真的寫了。字典成了小說的部分，把無法融入小說又認為值得保留的故事、事件、報告等，整理成字典裡的示例。」謝裕民：《建國》，頁 280。

宏觀歷史是來自於官方論述中單一敘述模式的閱讀歷史的方式。《馬橋詞典》中雖然沒有一個主角，但每位「馬橋人」都是有著自己獨立的思維與間接。如韓少功在《馬橋詞典》中刻畫了生動的馬橋族群，透過個別發生的事件思考文化及語言的衝擊。同樣地，謝裕民在《建國》中因為對生活與歷史感到困惑，開始「生產」辭典，尋找出一個可以自主挖掘與探索的地方的歷史軌跡。因此，《建國》可以被視為是一個作者個人的回憶記錄之外，也是對一個地方的地方史進行了深刻的思考。

四、結論：實驗性論述與新華文學

謝裕民的小說反映出歷史的多重問題。在新華文學中，敘述歷史與批判歷史的作品並不少見，但是對歷史的多重建構論甚少有學者關注。然而，在謝裕民的小說中卻多有涉及，顯示他對書寫歷史化小說的執著與熱愛，無論是從歷史發生、地圖索驥、成長生活或是詞典的敘述模式皆能表現。對謝裕民而言，他以偏向歷史文化的寫作為策略，進行歷史化小說的實驗書寫，並且從個體出發，以建構新加坡（人）身分為終極關懷。他以不同的敘述模式，從差異性的出發點思考歷史，有意識地指向新加坡華人社會的面向。謝裕民被評論者認為是一位「視新加坡為鄉土」的作家，更提到他是要寫出新加坡「城」中華人性格的演變和再形成，而這是真正屬於新加坡華文文學傳統的東西。⁴⁴ 小說有對歷史的重新審視與反思，也有現代小說的隱喻技巧，甚至是以新一代的新加坡人對於地方歷史的重新探索與定位，表達出「個人也是歷史的一部分」的思考，主張

⁴⁴ 黃孟文、徐迺翔：《新加坡華文文學史初稿》，頁 310。

了個體自由意識的重要性。小說中的人、地方與歷史述說著新加坡華族的發展敘事，同時建立了多樣化的實驗性書寫。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專書論文

1. 王班：《歷史與記憶：全球現代性的質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
2. 高嘉謙：〈城市華人與歷史時間：梁文福與謝裕民的新加坡圖像〉，收入鄭毓瑜主編：《文學典範的建立與轉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年。
3. 張中良，秦弓：《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小說敘事》，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4. 黃孟文、徐迺翔主編：《新加坡華文文學史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與八方文化企業公司聯合出版，2002年。
5. 黃孟文：《新華文學·世華文學：評論與史料選輯》，新加坡：雲南園雅舍，2008年。
6. 謝裕民：〈島嶼前身〉，《重構南洋圖像》，新加坡：富豪仕大眾傳播機構，2005年。
7. 謝裕民：《世說新語》，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1994年。
8. 謝裕民：《壹般是非》，新加坡：富豪仕大眾傳播機構，1999年。
9. 謝裕民：《重構南洋圖像》，新加坡：富豪仕大眾傳播機構，2005年。
10. 謝裕民：《甲申說明書：崇禎皇帝和他身邊的人》，新加坡：青年書局，2012年。

11. 謝裕民：《放逐與追逐》，新加坡：富豪仕大眾傳播機構，2015 年。
12. 謝裕民：《建國》，新加坡：富豪仕大眾傳播機構，2018 年。
13. 韓少功：《馬橋詞典》，北京：人民文學，2008 年。
14. Chatterjee, Partha.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5.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0.

二、期刊論文

1. 王德威：〈重構南洋圖像：理論與故事的交鋒〉，《漢學研究通訊》，第 37 卷第 1 期，2018 年 2 月，頁 1-7。
2. 王德威：〈華語語系的人文視野與新加坡經驗〉，《華文文學》第 3 期，2014 年 3 月，頁 5-20。
3. 朱崇科：〈論謝裕民對新加坡性格的再現〉，《玉溪師範學院學報》，第 33 卷第 1 期，2017 年，頁 22-31。
4. 張松建：〈家園尋根與文化認同：新華作家謝裕民的離散書寫〉，《清華中文學報》，第 12 期，2014 年 12 月，頁 425-467。
5. 黃曉燕：〈新加坡作家謝裕民筆下的歷史書寫〉，《外國文學研究》，第 6 期，2018 年，頁 64-72。